

政府会晤,由于船津此次仍就条约问题纠缠,所以并无实质性的进展[《河南禁运制钱事》(1918年5月15日),档号:03-18-085-01-008]。日使仍不罢休,多次向北洋政府发电催询,为避免日方的无谓纠缠,北洋政府就河南有关制钱各案向日方做了一个总结,小柴案“地方官照章扣留充公,原无不合,应免再议”,其他有关各案“办理均无不合,况多系案结经年,概应免议”[《河南扣留日商制钱案》(1918年6月28日),档号:03-18-085-01-011]。

综上所述,日人贩运制钱经历了由沿海到内地的延伸过程,大致说来,主要就是围绕其势力所在地由近及远地展开。旅顺口及大连湾是日本较早在中国大陆占有的据点,因而制钱贩运事件率先从这里开始,并不断向京津地区延伸。贩运案件不仅促使北洋政府有关禁令的出台,其有关案件处理情形也为其他各地所援引。只不过日人势力在各地情形不一,所取得的效果也因地而异。在日人势力较强之地,如山东,日本当局通常是放任纵容,“彼于事前则持放纵主义,事后则加无理争执”[《咨送东省交涉节略》(1917年3月30日),档号:03-18-086-03-008],即使有北洋政府的严正交涉,日方对涉案人员也只是轻罚了事甚或借词袒护。而在其势力较弱之地,如河南,对于政府扣留事件,日人往往只能借口条约事项进行抗议、交涉。面对日方的交涉,北洋政府在日人势力较强之地山东,采取妥协、退让的方针,以图稳定大局。而在内地日人影响较弱之地河南,采取严格执行、维护国法的政策,虽然对日人贩运事情有所遏制,但由于北洋政府的妥协退让,使得制钱仍源源不断地流往海外,直接造成了20世纪20年代某些省份一定程度上的钱荒,也间接造成了30年代农村金融枯竭、经济破产,这些都是北洋当局所始料未及的。

收稿日期 2014-09-21

作者王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9。

【责任编辑 雪 蓉】

## 理查三世、都铎神话与莎士比亚

辛雅敏

2012年,由莱斯特大学和理查三世协会共同组织的一场考古活动,在莱斯特市中心发现了一具遗骸。2013年2月,莱斯特大学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对外宣布此具遗骸便是英国历史上最具争议的国王理查三世。这一发现成为当年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引起了历史学家和普通民众对理查三世的普遍关注,许多人甚至希望这个考古发现能够为重新评价理查三世的历史地位提供新的证据。那么,理查三世为何具有争议?争议从何而来?谁在操纵对他的书写和评价?这一系列问题再一次摆在了我们面前。

一切都要从金雀花王朝的末代君主理查二世被迫让位开始讲起。亨利·博林布鲁克(Henry Bolingbroke)是理查二世的堂弟,他们的爷爷都是爱德华三世。亨利的父亲是兰开斯特公爵冈特的约翰(John of Gaunt)。冈特的约翰长期把持朝政,因而与理查二世不和。理查二世在他死后没收了他的封邑,但此举引起了亨利·博林布鲁克的夺权,最终理查二世被迫让位,亨利自己于1399年即位成为亨利四世,同时也建立了英国历史上的金雀花-兰开斯特王朝。但亨利的篡位也埋下了兰开斯特与约克两大家族不和的祸根,最终导致了血腥的红白玫瑰战争。在经历了亨利五世的短暂辉煌之后,孱弱且患有精神疾病的亨利六世不再能够控制贵族的内部纷争,红白玫瑰战争于1455年彻底爆发。此后的三十年间,英国的权力争夺十分激烈。1460年亨利六世被俘,但过于骄傲的约克公爵理查很快被反扑的兰开斯特军队所杀,其子爱德华于次年再次打败兰开斯特大军,即位为爱德华四世,并建立了短命的金雀花-约克王朝。

约克王朝内部的争斗加速了它的覆灭。爱德华四世死后,其子年幼的爱德华五世即位,其弟格罗斯特公爵理查被封为护国公。但在加冕之前,爱德华五世便和弟弟约克公爵理查一起被叔叔理查剥夺了王位继承权,理由是爱德华四世与王后伊丽莎白·伍德维尔(Elizabeth Woodville)的秘密婚姻不合法。两位王子随即被囚禁于伦敦塔中,继而失踪,成为著名的“塔中王子”之谜。护国公理查即位加冕,成为理查三世。然而仅仅两年后的1485年8月,兰开斯特家族的远亲里士满伯爵亨利·都铎(Henry Tudor)便在法国人的帮助下于博斯沃思战役中打败了理查三世,理查三

世战死于乱军之中。亨利·都铎随即即位,建立了都铎王朝,史称亨利七世。至此,兰开斯特和约克两大金雀花王朝的旁支之间的血腥战争终于结束,英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篇章。

但是,问题在于,在封建君主的血统继承制度中,亨利·都铎的王位继承权并不强,甚至可以说非常勉强。亨利·都铎的母亲是来自兰开斯特家族的玛格丽特·博福特(Margaret Beaufort),玛格丽特的曾祖父是亨利四世的父亲冈特的约翰;而亨利的爷爷欧文·都铎则娶了亨利五世的法国遗孀凯瑟琳,因此他的父亲和亨利六世是同母异父的兄弟关系。在讲究血缘继承的封建制度中,仅凭这样的远亲关系显然很难令人信服。因此,亨利·都铎在1486年与约克王朝国王爱德华四世之女约克的伊丽莎白(Elizabeth of York)结婚,希望通过这一政治婚姻来宣布约克和兰开斯特两大家族的合并,并以此来强化自己的王位继承权。

不过,出于对王位继承权的心虚,亨利七世所做的并不止这些,他还企图用修史的方法来美化自己,进而达到操纵意识形态、强化统治的目的。根据剑桥大学著名学者、历史主义莎评家蒂利亚德(E. M. W. Tillyard)的研究,为了强化自己的王权,这位国王一方面鼓励人们将他和约克的伊丽莎白的婚姻视为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和上帝恩典的体现,另一方面还复活了亚瑟王的英国古老传说,声称自己的家族便是亚瑟王再世,而且再世的亚瑟王必将带领英国进入黄金时代。于是,从1399年到1485年这近一个世纪的前都铎时代的历史叙述就被笼罩在一种由亨利七世本人所开创的“都铎史学传统”之下。这种被“都铎传统”所重述的历史被蒂利亚德称之为“都铎神话”(Tudor Myth)。都铎神话对历史的书写一直延续到莎士比亚所生活的伊丽莎白时代。

根据蒂利亚德的研究,亨利七世的御用史学家意大利人波利多·维吉尔(Polydore Vergil)首次为都铎神话提供了历史模式和意识形态框架。维吉尔于1501年来到英国,大概在1507年左右应亨利七世之邀开始写作拉丁文的《英国史》(Anglica Historia),但直到1534年亨利七世死后多年才得以出版。维吉尔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他的历史叙述的特点是尽量追求公正客观,试图理解历史人物的行为动机,并寻求历史事件背后的因果规律[蒂利亚德:《莎士比亚历史剧》(Tillyard, *Shakespeare's history plays*),伦敦:企鹅出版公司1962年版,第34页]。但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维吉尔用一系列的因果报应来解释从亨利四世到亨利七世这近百年的英国历史,并将这一切归因于上帝的正义与对罪恶的惩罚。于是,一系列的惩罚之后,在上帝的指引下,希望最终落在了都铎家族的身上,这便是都铎神话的意识形态框架。

都铎神话后来由托马斯·莫尔、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霍林谢德等人加以完善,尤其是霍尔于1548年出版的编年史《兰开斯特与约克两大高贵而显赫的家族之联合》(*The Union of the two noble and illustre families of Lancastre and Yorke*),将亨利七世与约克的伊丽莎白的联姻视为动荡时代的终结和新时代的开始。蒂利亚德认为,霍尔的重要性一方面在于,“作为英国史家,他是第一个完整地再现了教会势力松懈、中世纪衰落、民族主义兴起以后那种新的历史的道德化”(蒂利亚德:《莎士比亚历史剧》,第42页);另一方面就在于,他发展并确定了都铎神话思想。在霍尔那里,如何从混乱的角度看待并珍惜秩序,便是都铎神话的重要内涵。作为历史主义莎评家,蒂利亚德进一步指出,霍尔是莎士比亚最重要的题材来源,因此莎士比亚的历史剧正是都铎神话的反映。

## 二

蒂利亚德对莎士比亚历史剧的创作背景和故事来源的研究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尊重,他对都铎神话的概括也得到了许多历史学家的认同。但与历史学家们不同,蒂利亚德只关注都铎王朝的历史学家所记录的人物和事件对莎士比亚的影响,不太在乎它们是否真实。而历史学家关心的则是都铎神话是否对历史有所歪曲。这个答案无疑是肯定的。在许多历史学家看来,被亨利·都铎所打败的理查三世是都铎神话的最大受害者,因此对理查三世的诬蔑也是都铎神话的一个重要内容。

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道尔(Paul Murray Kendall)就在蒂利亚德研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考察了理查三世的形象是如何一步步被都铎神话所扭曲的。“理查三世的名声本身就是一出戏,它展示了不断累加的情节,强有力的核心冲突,一幕幕激情、不屑、责骂、嘲弄不断上演。450年前这出戏就开始上演,但至今还没有演完。而占据这出戏核心位置的正是都铎神话……”[保罗·肯道尔:《理查三世》(Paul Murray Kendall, *Richard III*),纽约:诺顿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496页]虽然在这里借用了蒂利亚德的“都铎神话”这个概念,不过肯道尔和大部分历史学家一样,大多数时候用的是“都铎传统”(Tudor tradition)一词。肯道尔基本认同蒂利亚德对都铎神话的描述,他对都铎神话的定义是“一种所谓的事实集合和关于15世纪英国历史的态度和信念,这一切在亨利八世统治时期得以流传开来,并在莎士比亚的《亨利六世》三部曲和《理查三世》中获得了最终的表达”(同上,第496页)。

那么,理查三世是如何一步步变成莎士比亚笔下的那个恶棍的?

其实,早在亨利七世统治时期的历史学家笔下,理查三世就已经开始出现明显的被丑化趋势。在这方面,约翰·劳斯(John Rous)的《英国列王记》(*Historia Regum Angliae*)是最早出现的历史文献之一。根据劳斯的说法,理查三

世的母亲怀胎两年才生出理查,这个小儿理查一出生就有长有牙齿和头发,而且长发及肩。不仅如此,劳斯还提到了理查三世那些后来广为流传的特点:身材矮小、脸比较短、右肩比左肩高。理查三世的一些罪行也被提及,比如他对亨利六世和安妮王后的死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值得注意的是,劳斯在理查三世当政时期是为约克家族服务的,当时他还曾经形容理查三世是一位“好君主”。由此可见历史叙述是如何被包括都铎神话在内的权力运作所塑形的。

对理查三世决定性的描绘发生在亨利八世统治时期。在此问题上肯道尔也继承了蒂利亚德的观点,认为都铎历史学家维基尔为都铎传统提供了意识形态框架和历史模式,但他进一步指出,是托马斯·莫尔塑造了理查三世的邪恶形象。莫尔的《国王理查三世本纪》(*The History of King Richard III*)一书写作于1513年左右,但直到1543年才被收录在别的史书中面世,1557年得以正式出版。根据莫尔的说法,理查三世身材矮小、五官不端正、驼背、左肩比右肩高许多(与劳斯的描述相反)。莫尔笔下的理查三世所犯的罪行也令人发指,他不仅是害死克拉伦斯公爵和亨利六世的罪魁祸首,而且其篡位行为也密谋已久,篡位后他还迫害无辜的伍德维尔家族,并残忍地杀害了塔中王子。莫尔对理查三世谋杀塔中王子的记载不仅详细,而且生动。他详述了整个过程,包括理查三世先命令伦敦塔总管布拉肯伯里(Robert Brackenbury)实施弑君罪行,但被正直的布拉肯伯里拒绝,然后经过格林(John Greene)的推荐找到詹姆斯·提瑞尔(James Tyrell),提瑞尔又找来福瑞斯特(Miles Forest)和戴顿(John Dighton)两位凶手,由这二人实施了刺杀行动。

肯道尔指出,莫尔之所以这样描绘理查三世,可能有两个原因。首先,莫尔的信息来源决定了他对理查三世的看法。从1490年到1492年,莫尔曾经在坎特伯雷大主教约翰·默顿(John Morton)的家中做侍从,此时还是少年的莫尔也许听到了许多关于理查三世的议论。但默顿和理查三世是死敌,默顿口中的理查三世也必然是被丑化的——甚至有史学家认为《国王理查三世本纪》的真正作者正是默顿本人。当然,除了默顿口中的理查三世,莫尔也可能从都铎王室的宫廷闲谈中听到一些关于理查三世的描述。在这些基本信息的基础上,莫尔丑化理查三世的第二个原因便是他自己的写作动机。肯道尔指出,莫尔作为著名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学者,其历史写作的目的是为了“教育当时的君主”,因此他希望通过树立一个反面典型来教育当时的执政者。因此,莫尔的目标“主要不是以丑化理查三世来取悦都铎王室,而是将其信息来源中已经被丑化过的人物以人文主义教育的正当理由进行了夸大处理”(同上,第501页)。

另一位都铎历史学家爱德华·霍尔不仅深化了亨利七世和理查三世之间的善恶对比,还明确指出亨利七世和约克的伊丽莎白的婚姻意味着英国历史上由亨利四世篡位所开启的混乱时代的结束。因此,霍尔不仅继承了莫尔对理查三世的描绘,而且还进一步发展了维基尔的都铎神话的意识形态框架。更重要的是,他深刻地影响了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创作,可以说是都铎神话发展史上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是都铎神话由历史进入文学的重要中介。

当然,在塑造理查三世负面形象方面影响最大的无疑是莎士比亚,诚如肯道尔所言,“都铎时期的编年史家为后来的历史学家们塑造了理查三世的形象,而莎士比亚却为其他所有人拼凑出了他们对理查三世的想象。”(同上,第505页)。在莎士比亚那里,理查三世可谓罪行累累,恶贯满盈,以至于最后众叛亲离,不得善终。莎士比亚不仅让理查三世背负了莫尔所赋予他的种种罪行,而且还刻画了他的心理扭曲。这部戏剧作品的开篇便是理查三世的自白:“这歌舞升平的世界偏没有我打发时光的乐趣和消遣。我只配呆看着阳光下自己的黑影,恨自己生就这残废丑陋的身材。既然我做不成附庸风雅的情郎,享受那醉人的情话绵绵的好时光;我横下心来,决定做一个坏蛋,恨透当前那没日没夜的欢乐。”(方平编译:《莎士比亚全集》第8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410页)作为一个戏剧人物,一心想做坏人的理查三世不仅将杀害亨利六世及其儿子爱德华、设计陷害其兄克拉伦斯公爵、杀害黑斯廷斯勋爵、杀害塔中王子、毒死妻子安妮等等罪行集于一身,而且可以说寡廉鲜耻,将一个无恶不作的恶棍的形象演绎得深入人心。

### 三

那么,历史上真正的理查三世是什么样的?弑君、害兄、杀妻这些罪行到底是不是理查三世犯下的?

2013年的考古发现为我们还原了理查三世的样貌。根据头骨复原来的头像显示,理查三世五官端正,并不算丑陋。而且他的身高有五英尺九英寸(1.73米),也算不上十分矮小,只不过身材偏瘦。不过,让立志于为这位国王平反的人们略感失望的是,理查三世的脊椎骨明显扭曲,显示他有严重的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severe idiopathic adolescent-onset scoliosis),而且这种先天疾病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日趋严重,并很有可能造成右肩比左肩高[理查德·巴克利等:“停车场里的国王”(Richard Buckley etc. The king in the car park),《古代研究》第87卷(2013年),第519~538页]。事实上,脊柱扭曲的特征也是此次考古发现的遗骸被认定为理查三世的重要根据之一。因此,虽然理查三世的相貌没有都铎时代所描绘的那么丑陋,身材也并不算矮小,但驼背和两肩不平却很可能是事实。不过,最近也有研究者认为,脊柱侧弯并不一定会导致背部外观的明显变化。

至于理查三世所犯的罪行和其他道德层面的行为,短期内的考古发现恐怕还不足以给出确定的答案,甚至未来也很难提供足够的证据。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理查三世绝没有莎士比亚所描绘的那么邪恶。根据莎士比亚的描写,

理查三世在杀死亨利六世及其儿子爱德华王子(Edward of Lancaster)之后,转而在爱德华的妻子安妮·内维尔(Anne Neville)哀悼亡夫的时候追求安妮,而且居然成功说服安妮嫁给自己,可以说狡猾和无耻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而且,莎士比亚还将克拉伦斯公爵乔治的死归因于理查三世,并暗示理查三世就是王后安妮·内维尔死亡的元凶。

但实际上,肯道尔的研究表明,当时所有的文献对爱德华王子死亡的记载都是“死于乱军之中”,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理查三世是凶手。不仅如此,有记载表明爱德华王子被杀的时候在场的人是理查的哥哥克拉伦斯公爵乔治,而不是理查。克拉伦斯公爵本人后来由于两次试图推翻自己的哥哥爱德华四世,最后被判死刑,可谓罪有应得,跟理查三世关系也不大。至于亨利六世的死,则明显应该是在爱德华四世的授意下被秘密执行的,只是当时的历史文献并没有记载具体是谁执行了这一命令。理查三世作为王室内务总管,很有可能向执行者传达了这一命令,但不太可能是执行者,当然也不能算是凶手。因此,不可能出现莎士比亚所描写的作为凶手的理查三世向被害人的妻子求婚这样戏剧性的场面。而历史上的安妮在丈夫爱德华死后为何会嫁给对立阵营中的理查三世,只能说贵族间的婚姻有着各种利益关系在作祟,安妮可以在失去父亲和丈夫的庇护之后找到新的归宿,而理查则可以通过这桩婚姻获得安妮父亲留下的一些遗产。而且有种种迹象表明,婚后的安妮和理查之间的关系甚至是很和睦的。因此安妮之死也不太可能是理查三世的罪行之一。

如果说文学家莎士比亚和历史学家莫尔等人对理查三世的大部分丑化都很容易被推翻的话,那么在都铎神话所描绘的理查三世的所有罪行中,最难以为其开脱、也最著名的便是谋害两位塔中王子。不管是迫于来自爱德华四世的女后伊丽莎白·伍德维尔及其家族的步步紧逼而求自保,还是处心积虑、苦心经营的政治阴谋,理查三世的篡位都是不争的事实。所以无论如何,篡位者的身份都让理查三世成为杀害先王之子的最大嫌疑人。而且这种嫌疑足够大,以至于在理查三世正式加冕之前,坊间就已有传闻认为两位小王子即将遭遇不测。最早提及此事的历史文献来自一位法国教士,其中明确说道:“爱德华四世的儿子惨遭杀戮,而凶手则按照人民的意愿被加冕为国王。”[保罗·肯道尔:《理查三世》(Paul Murray Kendall, *Richard III*),第467~68页]

不过根据肯道尔的研究,直到亨利七世统治时期,连同这个说法在内的所有早期文献对此事的描述都语焉不详,因此只能算是道听途说、捕风捉影,不能当作信史。对此事最早的详细描述正是出自托马斯·莫尔之手。莫尔对此事的记载据说来自实施此项罪行的提瑞尔本人的证词。提瑞尔在1501年因谋反被亨利七世逮捕,次年被处决。据说在审讯期间,他承认自己就是杀害塔中王子的凶手,并讲述了在理查三世授意下犯罪的整个过程。

肯道尔认为莫尔的描述虽然来自提瑞尔本人的证词,但是疑点重重,逻辑上也有许多不合常理的地方。而且,与莫尔几乎同时记载此事的维基尔也用了同样的材料,但却和莫尔的说法多有冲突。此外,同时期的文献中也能够找到塔中王子幸免于难的蛛丝马迹。显然,这些若隐若现的暗示并不能完全证明理查三世的无辜,更何况17世纪在伦敦塔中发现的两个孩子的遗骸在1933年已经被两位医生证明分别为10岁和12岁左右。如果这两个遗骸正是塔中王子,那么这个死亡年龄是符合理查三世在位的时间的。

尽管如此,包括肯道尔在内的理查三世的辩护者们还是希望通过增加嫌疑人的方法来为理查三世开脱。在这些历史学家们看来,除了理查三世,至少还有两个人有可能谋害塔中王子,他们是亨利七世和白金汉公爵亨利·斯塔福德。如果塔中王子能够活到1485年亨利七世登基以后的话,那么由于亨利七世的王位继承权非常弱,他就有足够的动机杀害先王的儿子,而且完全有能力掩盖罪行。至于白金汉公爵亨利·斯塔福德,因为其血缘可以追溯到爱德华三世,所以也有微弱的王位继承权,而1483年的叛乱也让他夺取王位的野心进一步昭然若揭。因此许多史学家相信,不管是否是最终的元凶,白金汉公爵和塔中王子之死也脱不了干系。不过肯道尔也承认,这三个嫌疑人中理查三世的嫌疑最大,因为他的篡位是不争的事实。而在王位争夺的历史上,废黜一位国王也往往意味着这位国王已经被判处了极刑。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谁杀害了年幼的塔中王子,理查三世都是这场悲剧的始作俑者。

其实,历史上的理查三世是否是一个暴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理查三世是如何被权力书写和构建成为一个暴君的。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都铎神话本身就是权力的产物,而被都铎神话所丑化的理查三世经过一系列历史书写中的权力运作,终于在莫尔那里基本定型;之后,经过戏剧大师莎士比亚的文学书写,他终于成为邪恶的化身,并背负这一负面形象达数百年之久。这是一个历史被重新构建的过程,肯道尔和蒂利亚德都不是新历史主义者(甚至恰恰相反,蒂利亚德还是新历史主义所反对的“旧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但从他们的研究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充斥着权力与意识形态话语的各种力量是如何将历史变成一种可书写的文本,追求公正客观的历史学家是如何不由自主地以解释历史为名歪曲历史,以及历史与文学如何相互影响的。

收稿日期 2014-12-25

作者辛雅敏,文学博士,郑州大学文学院讲师。河南,郑州,450001。

【责任编辑 池 豫】